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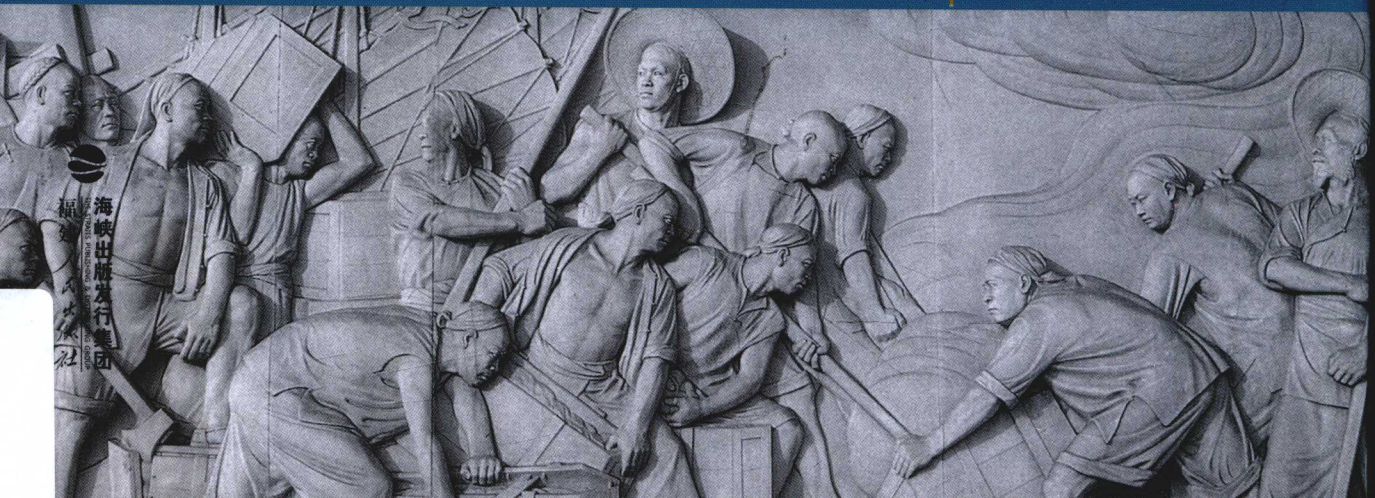
鸦片战争史

中国历史发展中第三次社会大变革研究

第二版

Yapian
Zhanzheng
Shi 下

萧致治 主编



海峡出版发行集团
福建人民出版社

鸦片战争史

中国历史发展中第三次社会大变革研究

第二版

Yapian
Zhanzheng
Shi 下

萧致治 主编



海峡出版发行集团
福建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鸦片战争史：中国历史发展中第三次社会大变革研究：全 2 册/
萧致治主编。—2 版。—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17. 6

ISBN 978-7-211-07703-8

I. ①鸦… II. ①萧… III. ①鸦片战争 (1840—1842)
—研究 IV. ①K253.0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7) 第 138181 号

鸦片战争史 (上、下)

YAPIAN ZHANZHENG SHI

——中国历史发展中第三次社会大变革研究

主 编：萧致治

责任编辑：郑翠云

美术编辑：白 玫

出版发行：海峡出版发行集团

福建人民出版社

电 话：0591-87533169 (发行部)

网 址：<http://www.fjpph.com>

电子邮箱：fjpph7211@126.com

地 址：福州市东水路 76 号

邮政编码：350001

经 销：福建新华发行 (集团) 有限责任公司

印 刷：福州万达印刷有限公司

地 址：福州市仓山区金山大道 618 号橘园洲工业园 19 号楼

开 本：787 毫米×1092 毫米 1/16

印 张：52

字 数：905 千字

版 次：2017 年 6 月第 2 版

2017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ISBN 978-7-211-07703-8

定 价：168.00 元

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影响阅读，请直接向承印厂调换

版权所有，翻印必究

第九章 英国扩大战争 中国军民坚持斗争

一、义律去职与璞鼎查来华

鸦片战争的第二阶段，在短短半年时间内就以清政府由战到和而告结束。这一阶段清政府在军事上的失败，证明了它本身已没有能力战胜英国侵略者；而清政府再次妥协的过程，更充分暴露了它的极端虚弱和愚蠢。如果把这次妥协与前一次比较，可以看出它更具有一厢情愿的特点。清政府满以为在它做出更大让步之后，就会停战，进而恢复战前的局面；可是英国侵略者在其野心完全实现之前，压根儿不打算就此罢休，而是加紧准备扩大战争。这个特点决定了妥协的短暂性和战事最为频繁的第三阶段的迅速到来。

1841年8月，侵华英军休整完毕，已经做好了再次北犯的准备。与此同时，从加尔各答开来增援的英军皇家第五十五团近800人也到达香港。就在英军即将乘南季候风出动的时候，英国方面发生了重要的人事变动，这就是义律的去职与璞鼎查来华。

义律从1834年随律劳卑来华到1841年，在华从事殖民侵略活动已达七年之久。他庇护鸦片走私贸易，破坏中国司法主权，蓄意进行武装挑衅，狂热煽动侵华战争，率军进犯中国沿海，强行霸占中国领土，等等，可以说为推行英国侵华政策竭尽了犬马之劳。正因为这样，他得到英国政府赏识，官运亨通，由一个秘书顺利地爬到驻华全权公使的位置。既然如此，为什么在英国侵华战争尚在进行的时候，义律却被撤了职呢？原因是英国政府对这次战争的胃口很大，很不满意义律的一些做法，认为其十分有碍于政府意图的实现。

1841年1月9日，英外交大臣巴麦尊看到海军部咨送的懿律的三份报告，了解到英军首次北犯和中英天津谈判的情况。他马上致函义律，对其处置提出

了两点指责：一、义律默认了琦善照会中所表现的“妄自尊大”。他写道：“据我看来，监督义律海军上校在他和中国人的交往中，有意按照一项错误的原则行事；而且在容忍他们的骄傲自负以及默从和仿效他们的行动方式方面有意采取过分的斯文态度。”二、义律在清政府没有接受英国条件之前就同意从天津南还，背离了所奉训令；而且，“如果中国政府的目的在于拖延，那末，很显然，在帝国最南端的广州进行交涉，比在白河口或在较广州距北京更近的任何其他地方去交涉，可以更好地达到这个目的”^①。巴麦尊在函中强调：义律必须把政府训令中指为不可少的一切条件都争取到手。

应该指出，义律作为鸦片战争的一名煽动者，在以大炮轰开中国大门、奴役中华民族这一根本问题上，与英国政府的立场是毫无二致的，但在达到这些目的的具体做法上与英国政府之间存在着分歧。

首先，关于要强加给中国的不平等条约，英国政府一直坚持它在战前就已拟出的草案，认为这个草案“是根据许多很熟悉中国情况的人们各种各样的来信制定的”，既参酌了今后英国“对华通商的利益和安全”，又照顾到了“可能劝说或必要时强迫中国政府同意做出的让步”。^②但义律对草案中的某些条款持有异议。例如，草案中规定除广州之外，还要允许英国臣民在厦门、宁波、上海等处有居住自由，享有生命财产的完全保护；而义律却认为，这项规定“只不过是把一极可贵的人质（指英国商人）放在一个激怒的政府手里”，势必会酿成新纠纷，因而是不明智的。^③草案中又规定：侵华英军的所有费用应向清政府索取补偿，在这笔赔款与烟价、商欠付清之前，英军不能撤出所占领的中国领土。而义律认为这“是一件很麻烦的事”，“比较妥当的方法应是对于这些费用的赔偿确定一个总数，并且在一个一般商定的期间或在预定妥的军事行动过程中，强制这笔款项的彻底付清，而不必在和约中加进任何牵涉到将来付款的条件”。^④草案中还明文规定由清政府偿还商欠，并废除行商对于中外贸易的垄断。

^① 《巴麦尊子爵致驻华全权大臣懿律海军少将及义律海军上校函》（1841年1月9日），《英国档案有关鸦片战争资料选译》下册，第687、688页。

^② 《巴麦尊子爵致驻华全权大臣懿律海军少将和义律海军上校函》（1841年2月3日），《英国档案有关鸦片战争资料选译》下册，第708页。

^③ 《查理·义律致奥克兰勋爵函》（1841年6月21日），转自马士：《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第1卷，第738页。

^④ 《查理·义律致奥克兰勋爵函》（1841年6月21日），转自马士：《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第1卷，第737页。

而义律认为对行商清偿债务“是根本不应施加压力的”，否则对英国本身不利；而且“对于公行和整个独占制度，不应在任何和约中，作任何直接规定，而只是为帝国（指英国）的商人和船舶争取到同我们自己居留区贸易的允许，用这种方法，使它在实际上渐归消灭，这样就足够了”。^① 由于上述分歧，义律在准备逼迫琦善签订的《条约草案》（即所谓《善定事宜》）中，削减了政府原案中的开放广州以外的四口、补偿英军军费等条款，关于偿还商欠和废除行商垄断的规定，也与原案有所不同，并未强调商欠问题要由清政府直接负责，而且声称要在商欠偿清后再废除行商垄断。后来，当英军首次闯进珠江时，义律在向广东当局发去的所谓《约议戡兵条款》中，虽提出了“偿还英国军师使费暨商人亏失诸项，准以洋银 1200 万元赔缴”^②，给予英国以最惠国待遇等条款，但旋因急于恢复贸易而收回。而且在准备再次北犯时，也未打算改变上述看法。

其次，在进行侵华战争的策略上，英国政府认为英军对清政府“有效的打击应该打到接近首都的地方去”，“广州距离北京太远了，所以那儿的任何行动都没有决定性意义”。^③ 并明确规定在清政府拒绝谈判或谈判破裂时，英军要不间断地以武力进犯，一直到清政府无条件屈服为止。但义律的看法却是：英军在广州的“某种决定性示威，不但是必要的，而且也是适宜的”^④；同时，从保证英国关税收入和英商的实际利益、促进英国对华贸易的立场出发，义律还竭力在与清政府敌对的状态下维护广东中英贸易畅通无阻的局面，这也是鸦片战争第二阶段中广东出现谈谈打打、打打谈谈局面的一个重要原因。当然，义律并不反对英国政府确定的战略方针，他认为在自己的做法取得很大成效、各方面准备工作就绪之后，就要按此方针行事了。

第三，对于英军是否要长期盘踞舟山群岛问题，英国政府与义律意见相左。舟山群岛是英国战争计划中的首要攻占目标，特别受到英国政府的重视。这不仅是“因为它将给英国贸易提供一个通往中国东海岸中部物产丰富、人口稠密的乡村和城市的机会”，“使英国商品容易进入中华帝国的腹地”^⑤；而且也是由

^① 《查理·义律致奥克兰勋爵函》（1841年6月21日），转自马士：《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第1卷，第737—738页。

^② 佐佐木正哉编：《鸦片战争の研究》（资料篇），第86页。

^③ 《巴麦尊致海军部》（1840年2月20日），《近代史资料》1958年第4期，第70页。

^④ 《查理·义律致奥克兰勋爵函》（1841年6月21日），转自马士：《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第1卷，第736页。

^⑤ 《巴麦尊子爵致驻华全权大臣懿律海军少将和义律海军上校函》（1841年2月3日），《英国档案有关鸦片战争资料选译》下册，第711页。

于它本身为战略要地，对于英军在华顺利展开军事行动、要挟清政府接受英国条件，都有重要意义。所以，英国政府训令明确规定，对舟山群岛不仅要攻占，而且还要长期盘踞。但义律认为，广东沿海的香港较之舟山群岛更适合作为英国强占的对象，加上盘踞舟山群岛的英军瘟疫流行、死亡相继，而广东方面又痛感兵力不足，不如撤出舟山群岛，以集中力量强占香港并在此稳住阵脚，因此在1841年1月做出了从舟山群岛撤退英军的决定。

义律上述违反英国政府训令的做法，在英国政府看来，不利于实现英国发动战争的最终目的，因而是不能容忍的。这正是导致义律去职的根本原因。

1841年4月，巴麦尊收到了义律于1月间相继发出的关于在华战和情况的报告，十分恼火，他斥责义律说：“在你的整个处理过程中，你似乎已经把我的训令当成可以完全不必顾及的废纸，而你却完全任意依照你自己的幻想，处理你的国家的利益。”^①巴麦尊认为义律“甚至在舰队的行动已经获得完全的胜利（指英军攻陷沙角、大角炮台），他可以自由规定条款的时候，他好像还是同意了极其不够的条件”^②。具体说就是：鸦片赔款勒索得太少；赔偿军费与清偿商欠均无着落；没有为在华英人争得“安全保证”；在未达到英国所有要求之前就撤出了舟山群岛；香港的割让也结合着一项有关缴纳捐税的条款，使其类似澳门而未完全成为英国属地。英国女王维多利亚也对义律深为不满，说：“如果不是由于查理·义律的那种不可思议的奇怪举动，我们所要的一切或许已经到手了。”^③英国整个统治阶级都与巴麦尊和女王的看法一致，连一度反对发动鸦片战争的辉格党人（以格雷厄姆为代表），这时也公开支持巴麦尊，主张英国政府不应批准任何以义律与琦善之间的所谓“初步协议”为基础的条约。

在这种气氛下，4月10日，巴麦尊上书女王，不同意所订“初步协议”。21日，巴麦尊致函义律，详细列举了义律的处置违反政府训令之处，明确通知他：“你将不可能继续保持你在中国的职位。”^④30日，英国内阁会议正式决定：召回义律，改派璞鼎查接任英国驻华全权公使。

^① 《巴麦尊子爵致皇家海军义律大佐函》（1841年4月21日），转自马士：《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第1卷，第728页。

^② 《巴麦尊子爵上女王书》（1841年4月10日），转自马士：《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第1卷，第306页。

^③ 《维多利亚女王致比利时国王书》（1841年4月13日），转自马士：《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第1卷，第307页。

^④ 《巴麦尊子爵致皇家海军义律大佐函》（1841年4月21日），转自马士：《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第1卷，第729页。

璞鼎查（1789—1856年）是一个多年在东方国家从事殖民侵略活动的老手。他从14岁起就开始混迹于印度，不久加入东印度公司的陆军，17岁升任少尉。1810年，他装扮成马贩，在长达1600英里的印度、伊朗边境线上进行间谍活动。以后相继在孟买所驻英军、东印度公司供职，曾任驻信德王宫总督代表。璞鼎查在印度干了20多年分化、掠夺的勾当后，1840年返回英国，马上就因“功”受封爵士，并由上校晋升为少将。英国政府看中他的老奸巨猾，“很熟悉亚洲人的性情”^①，因而决定任命他为义律的接替人。

璞鼎查接到任命后，马上去请教已经当上议员的大鸦片贩子查顿，共商侵华问题。查顿对璞鼎查十分赞赏，他写信给马地臣说：“我已同他谈了两三次，极为满意。他急于得到情报。……我们把中国沿海的地形图摊开放在面前，讨论了许多困难的问题，相信谈得非常得力。”^② 1841年6月5日，璞鼎查启程离开伦敦。在这前后，巴麦尊几次发出训令，指示他以武力为后盾，迫使清朝政府无条件接受英国的全部要求。训令重申了英国政府的下述要求：第一，全部赔偿鸦片烟价，偿清行商债务，支付英军战费；第二，或者割让中国沿海岛屿给英国君主，或者由中国皇帝对英商提供完全保证，允许他们自由贸易，废除行商垄断制度，对与英商贸易的中国臣民不加任何额外限制；第三，允许英商赴厦门以北（包括厦门在内）中国东海岸上各主要城镇贸易，为此，两项条件任选其一，或是准许英商定居、寄居这些城镇，每个城镇常驻英国领事，或是割让东海岸某岛屿，并准该岛屿与大陆各城镇间自由通商。香港不能放弃。此外，训令还特别提到：“中国政府应把鸦片贸易置于某种正规的和合法的基础之上，这是十分重要的”^③，要璞鼎查抓住一切有利机会，以“照理”所能想到的一切论据使清朝政府做到这一点。后来，巴麦尊了解到义律拟定的再次北犯计划以及英印总督奥克兰对这一计划的支持，又指示璞鼎查途经印度时与奥克兰充分交换意见。

璞鼎查行动十分迅速，7月7日抵印度孟买，逗留10天后动身来华，于8月10日（六月二十四日）抵达澳门。英国东印度海军总司令巴尔克奉命统率侵华英国海军，与璞鼎查同时来华。24日，义律与前海军司令伯麦启程离华，经由孟买回国。

璞鼎查一到广东，立即摆出扩大侵华战争的架势。他向广东当局通知了英

^① 马士：《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第1卷，第327页。

^② 转自《外国学者论鸦片战争与林则徐》下，第13—14页。

^③ 《巴麦尊子爵致璞鼎查爵士函》（1841年5月31日），《英国档案有关鸦片战争资料选译》下册，第906页。



璞鼎查像

方的人事变动，扬言英军马上要再次北犯，“迨至大清准可依照大英国家所讨各款定事，然后即可无庸为战”^①。广东当局派代表试图与璞鼎查交涉，璞鼎查置之不理。与此同时，璞鼎查还向在华英商发出通知，声称：把“国家利益置于商务利益之下的时代已经过去”，他的首要任务是“迅速而满意地结束战争”，他“将不能容许任何有关商业或别种利益的考虑，来阻碍他为了要促成一个荣誉而持久的和平，在认为有必要的时候，对中国政府及其臣民采取强硬的措施”。^②

8月22日（七月初六日），璞鼎查留下8艘舰船和部分陆军据守香港，自己率领10艘战舰、4艘轮船、1艘测量船和22艘运输船组成舰队，载运作战英军2519名，开始再次北犯。直至此时，奕山等还是不如实奏报，而是含糊其词地说英军舰队“出洋北驶”，并将其原因荒唐地解释为义律“不先告璞鼎查以早经通商，诡使北上恳求马头”。^③清廷见奏之后，丝毫没有察觉战局已发生重大变化，仍然维持从沿海各省撤退防军的决定。

二、英军攻陷厦门

璞鼎查率军北犯，行动计划与义律所拟的大致相同，第一个攻击目标便是厦门。

在鸦片战争初期，厦门几次受到英舰进犯。鉴于厦门“东为台、澎唇齿，西为泉、漳门户，北达会垣，通省咽喉所在，一有梗塞，则全体颓坏不支”^④，自邓廷桢调任闽浙总督后，这里一直是福建官府的重点防区。邓廷桢被黜后，福建巡抚吴文镕继续采取措施加强厦门防务。截至1841年2月颜伯焘到职为止，厦门的水操台、头巾礁、大炮台、小炮台、屿仔尾等扼要之处，共安设大小炮279门，驻兵约2800名。自白石头至沙坡尾一带，筑起了高1丈、厚8尺、长

① 《璞鼎查照会》，佐佐木正哉编：《鸦片战争の研究》（资料篇），第129页。

② 马士：《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第1卷，第326页。

③ 《靖逆将军奕山等奏报英领事璞鼎查出洋北驶及团练义勇情形折》，《鸦片战争档案史料》第4册，第15—16页。

④ 《吴文镕奏厦门不可许为通商口岸折》，《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二，第808页。

500丈的坚固石壁，石壁后每隔5丈设炮1门。靠近厦门城的安海汛、五通讯和高崎汛区域，也设炮百门，驻兵1400余名。厦门港口，有水师300人驾哨船10只守护。此外，厦门当局还募集了水勇、练勇9200多名。

颜伯焘上任（1841年2月17日接印）之后，“慨然有澄清海宇之志”^①，锐意主战。他曾上书斥责琦善、杨芳对英军的妥协，毫不留情地戳穿奕山等编造的谎言；并在清廷决定将林则徐遣戍新疆的情况下，奏言林则徐“能得人心，亦有威望”，请求让林在浙江充当裕谦的副手。^②对于福建沿海的防务，颜伯焘做了比较全面的布置：在厦门，除强化自身的防备之外，还在其海域的浯屿、青屿、大担、小担等岛屿上修筑炮台，以为屏障；台湾、澎湖与大陆隔着大海，虽险要林立，但潮涨水深之时大小船只无不可以进口，因此也要预为之备，所以向台湾拨去八千斤大炮4门、六千斤大炮2门，将前福建提督王得禄派往澎湖办理军务；其他沿海地区，澳口林立，不可能处处重兵设防，因而号召沿海绅民自行团练，保卫海疆。在抗敌的策略上，颜伯焘不赞成仅仅自守，认为这样做，“贼逸我劳，贼省我费”，使我失去了主动权。他看到清军“大炮止可施诸岸上，不能载之水中，小舟止可行诸内港，不能施之大洋”的弱点，筹划建立一支有较强攻击能力的舰队，与英军角逐于海上。据说他曾“请饷银二百万，造战舰五十余艘，募新兵数千，水勇八千，欲与出洋驰逐”^③。

就颜伯焘的上述表现而论，他与督抚将军中那班畏敌如虎、得过且过之辈自然不可同日而语，算得上是抵抗派行列中人。但他同林则徐这样杰出的抵抗派相比，又远远不及。首先，颜伯焘纨绔习气甚深，虚骄自大，既缺乏与侵略者做斗争的实际经验，也不曾对敌我双方的状况进行深入的分析研究，自以为是，十分轻敌。当时安设在厦门的大炮，有的炮身极重，非数十人不能拉挽。有人提出：“炮台在墙外，非用炮车拉回，则兵丁不敢出墙装药。”^④而把大炮装在炮车上，既便于灵活射击，又利于隐蔽自己。这本是合理的意见，但颜伯焘拒不听取，“言骄气傲，以为一炮即可灭贼，何须再装药也”^⑤。其次，颜伯焘言过其实，不是一个办事认真勤勉的实干家。他在4月中旬就奏称：“欲守厦门，

① 梁廷枏：《夷氛闻记》卷三，第83页。

② 《闽浙总督颜伯焘奏为裕谦林则徐可当广东之任片》，《鸦片战争档案史料》第3册，第555页。

③ 魏源：《道光洋艘征抚记》卷下，《魏源集》上册，第189页。

④ 张集馨：《道咸宦海见闻录》，第60页。

⑤ 张集馨：《道咸宦海见闻录》，第60页。

必先守浯屿，欲守浯屿，必并守大担、小担。各该处极须建盖石堡。”^①然而直至8月下旬，这些岛屿的石堡上，还未安设大炮，其拖沓作风由此可见。第三，颜伯焘对战局的发展变化缺乏判断力。他明知广东清军一败涂地，却幻想通过“暂事羁縻”使英军按兵不动，待朝廷做好一切准备之后再“奋力攻击”。^②《广州停战协定》签订后的暂时平静，使他误以为近期无事，遂于7月上旬将大部分厦门乡勇裁撤遣散，还支持水师提督奕振彪率师船、劲卒往浙海捕盗。正由于此，厦门重镇在英军空前凶猛的进犯前，防务反而比以前大为削弱：“屯军仅三千人，水勇亦不越千余人”^③。

8月25日（七月初九日）黄昏，英军舰队乘东南风联樯闯进厦门青屿口。颜伯焘正在城内，闻讯大惊失色，急调金门镇总兵江继芸来厦负责军事指挥，并派人上英舰询问来意。26日清晨，所派人员带回璞鼎查、巴尔克、郭富联名的劝降书。其中威逼福建当局马上将厦门城邑炮台让给英军据守，俟中英纷争解决之后再行交还，并称：如接受条件，即在各炮台上竖起白旗。颜伯焘断然拒绝了英军的劝降。

这天上午，双方都紧张地进行战前准备。

英方：璞鼎查和巴尔克直接参与对厦门的侦察。他们发现，厦门外围的各个炮台都筑得十分坚固，“全部工事是一个特别坚强的阵地”^④，对英军进攻威胁很大，于是决定先以战舰的密集炮火摧毁厦门外围防御工事，接着以轮船、舢板运送英军登陆。

中方：颜伯焘与兴泉永道刘耀椿驻扎城外虎头山，负责白石头汛至沙坡尾之间石壁的把守；江继芸上鼓浪屿，指挥该岛上的水操台、大炮台、鼓浪屿这三座炮台抵御英军。（事后颜伯焘曾奏称：他当时还传令厦门对岸之屿仔尾守军与鼓浪屿和厦门陆上守军相配合，三面兜击。但参诸英方记载，均未提到屿仔尾发生交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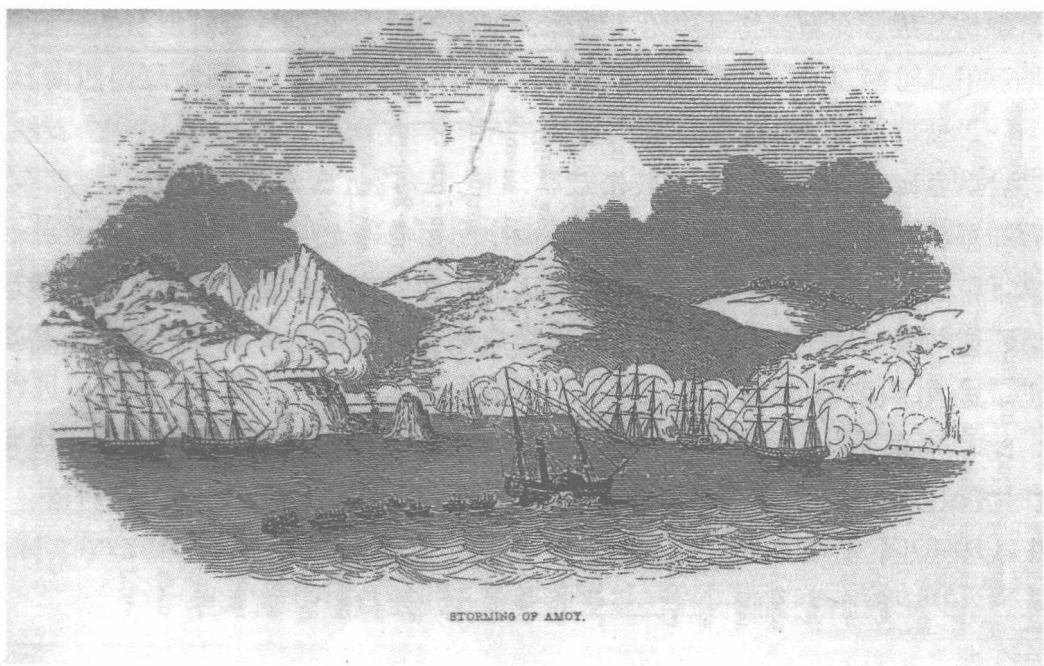
下午1时半，英军开始攻击。舰队分为四路：“布郎底”号、“都鲁壹”号、“摩底士底”号攻打鼓浪屿上炮台；“威里士厘”号、“伯兰汉”号攻打石壁（英军称为“长列炮台”），“西索斯梯斯”号、“皇后”号攻打厦门港口各炮台；

^① 《闽浙总督颜伯焘奏报厦门筹防情形片》，《鸦片战争档案史料》第3册，第353页。

^② 《闽浙总督颜伯焘奏报探闻粤省文武苟安三元里乡民抗英被压等实在情形折》，《鸦片战争档案史料》第3册，第554—555页。

^③ 林树梅：《从军纪略》，《鸦片战争在闽、台史料选编》，第145页。

^④ 宾汉：《英军在华作战记》，《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鸦片战争》第5册，第254页。



厦门炮台

“卑拉底士”号、“哥伦拜恩”号和“阿吉林”号闯过港口，驶向距厦门城最近之处，为英军占据登陆点。与英舰行动同时，厦门和鼓浪屿各炮台守军猛烈开炮轰击，“到处炮声隆隆，周围群山回响”^①。交战不久，英军就发现守军的弱点：各炮台之间缺乏配合，大炮只能直线定点射击。于是英军采取各个击破战术，“以二三艘并力攻一炮台。一台破，再攻一台”^②。尽管守军竭力回击，但无法抵挡英军的优势炮火，伤亡惨重。一个多小时以后，厦门港口和鼓浪屿上各炮台都被英军摧毁。英军随即离船登陆，分别占领。“未几而水勇先散，汀州兵遂大溃”，“延平兵亦溃”，“泉州兵又溃”。^③在水操台指挥作战的总兵江继芸见事不可为，投海自杀。一部分将士仍然英勇抵抗：鼓浪屿上，水师后营游击张然持大刀与英军格斗，连杀10余敌，刀折中弹，又拔剑拼刺，最后“凭树僵立而死”^④。把总李启明、杨肇基、纪国庆及兵丁40余名也壮烈牺牲。在厦门港口，“副将凌志以下多被伤且死，兵勇血肉狼藉，犹奋前拒敌”^⑤，凌志身先士

① 柏纳德：《“复仇神”号轮船航行作战记》，《鸦片战争在闽、台史料选编》，第173页。

② 魏源：《道光洋艘征抚记》卷下，《魏源集》上册，第189页。

③ 林树梅：《从军纪略》，《鸦片战争在闽、台史料选编》，第146页。

④ 吕世宜：《爱吾庐文钞》，《鸦片战争在闽、台史料选编》，第398页。

⑤ 梁廷枏：《夷氛闻记》卷三，第83页。

卒，带伤杀敌，在激烈搏斗中陷入敌阵，剖腹殉国。

下午2时半左右，英舰“威里士厘”号、“伯兰汉”号开到距厦门西南石壁约400米处，然后一刻不停地向石壁发射了“足足两个小时的炮火”^①。石壁系花岗岩条石砌成，英舰无法将其击毁。可是，在附近督战的颜伯焘，竟下令石壁后守军放弃阵地后撤，致使郭富所率两个团兵力毫无阻碍地在此登陆。

下午5时，厦门城外防线被英军突破。从各处登陆的英军占领了厦门城墙、西南石壁与厦门城之间的丘陵地带，准备攻城。夜幕降临，英军不明城内情况，停止了进攻，在城外露营。

此时颜伯焘已是六神无主，更谈不上重振士气，组织反击。当时有人进言：“此时厦城以南及鼓浪屿一带海岸，夷虽占据，其迤北而西，尚有百余村落，夷固未敢轻窥也，宜劝联守，召义勇，飞檄漳、泉协力恢复。”^②这是合乎实际的用兵方针，但颜伯焘不听，慌慌张张收拾残兵，连夜向同安退逃。

在城外露营的英军，本以为“一定会遭到中国人的许多困扰”^③，但却平平安安度过了一夜。27日（七月十一日）拂晓，英军经过侦察，发现厦门已经弃守，于是放胆入城，“侵占石寨（福建水师提督驻所）及各衙署，肆行拆烧，抢掳资财，奸淫妇女，焚毁庙宇”^④。官库中价值2万元的金银被英军抢夺一空，凡拿得动的东西都被英军搬上舰船。为了使厦门的武备彻底瘫痪，英军将军用造船厂、铸炮所、火药库全部破坏，并炸毁各处炮台与大炮。

英军的暴行激起厦门人民的愤怒反抗。一位陈姓农民组织数百群众，以抬枪与英军接仗，给敌人以较大杀伤。厦门中后路130余乡民众团练自卫，不时袭击英军，“凡有逆夷水陆栖止处所，昼则寻杀无时，夜则乱石向掷”^⑤。

厦门之战爆发之前，颜伯焘曾在奏章中夸口：“厦门稳如磐石。贼即未至，已行覆没。”^⑥然而事实却是：英军仅用半天时间就攻陷了这个军事重镇。导致

① 奥特隆尼：《对华作战记》第16章，《鸦片战争在闽、台史料选编》，第187页。

② 林树梅：《从军纪略》，《鸦片战争在闽、台史料选编》，第146页。

③ 柏纳德：《“复仇神”号轮船航行作战记》，《鸦片战争在闽、台史料选编》，第179页。

④ 《钦差户部右侍郎端华奏为遵旨查明厦门失守情形及兵勇数目折》，《鸦片战争档案史料》第4册，第481页。

⑤ 《闽浙总督颜伯焘奏报英船离岸开去多只并筹攻剿情形折》，《鸦片战争档案史料》第4册，第52页。

⑥ 《颜伯焘又奏厦门筹防情形折》，《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二，第981页。

这种结局的原因何在？

首先，厦门的防御体系本身存在严重缺陷。前面已经指出，厦门近海的浯屿、大担、小担都是厦门和鼓浪屿的屏障，但因颜伯焘及其下属的迁延拖沓，这些岛屿实际上没有设防，“以致第一重门户无从措手”^①。就厦门与鼓浪屿的防御设施而论，只注重各炮台本身的坚固，而不考虑它们相互之间的配合，没有形成交叉火力；再加上水师主力离开厦门，留守的水师官兵弃船而逃，这就使得英舰完全掌握着攻击的主动权，顺当地实现各个击破。并且，由于颜伯焘的轻敌思想，厦门防御体系完全立足于拒敌海上的方针，缺乏与敌陆上交战的准备，以致城外的大片丘陵地带没有构筑阵地，英军登陆后未遇到有力的抗击。

其次，主帅颜伯焘的不良表现加速了厦门之战的失败。如果说在战前，由于颜伯焘不知审时度势而放松了戒备，使厦门在英军来犯时陷于被动地位，那么，他在交战中也没有采取什么得力措施来弥补自己的过失。炮火纷飞之时，他把军事指挥的责任推给别人，自己除了在危急时刻下令撤军逃跑外，没有做一件值得称道的事。英军登陆之后，尽管清军失去要塞，队伍打散，但敌人也因不明地形、夜幕降临而不敢行动。如果颜伯焘沉着镇定，组织清军袭击敌人营地，同时在厦门城内外抢筑工事，那么，至少可以给英军以一定的杀伤，使之不能轻易占据厦门城。然而，颜伯焘此时已成惊弓之鸟，逃命唯恐不速，把有利的战机断送了。厦门一场战火，把颜伯焘的“澄清海宇之志”烧个精光，成为他从抵抗派变为妥协派的转折点。自此之后，“英夷船坚炮利，纪律禁严，断非我师所能抵御”^②，成了他的定见与口头禅。

厦门失陷的消息于9月13日（七月二十八日）传到北京。朝廷的太平幻梦又一次被打碎了。头一天还在催促浙江撤军的道光帝，只得自打耳光，重新传旨沿海督抚将军增兵严防，并命令颜伯焘等“趁此未及安定之时，设法克复”^③。从广州战役失败和厦门失陷当中，清政府发现以前认为英军只在海上凶猛、上岸即无能为力的看法不符合实际，惊呼英军在陆战中“逆焰犹然凶恶”^④。这固

^① 《闽浙总督颜伯焘奏报厦门已被英军侵占情形折》，《鸦片战争档案史料》第4册，第31页。

^② 张集馨：《道咸宦海见闻录》，第60页。

^③ 《着闽浙总督颜伯焘等迅速克复厦门并水陆并防等事上谕》，《鸦片战争档案史料》第4册，第63页。

^④ 《着盛京将军耆英筹防海口并严备陆路以保根本重地事上谕》，《鸦片战争档案史料》第4册，第64页。

然表明对英军的认识有所进步，但同时也更增添了其对英军的畏惧。

以连续猛烈的进犯打击清政府，促其尽快屈服投降，这是璞鼎查上任时的既定方针。因此，英军攻陷厦门后稍事休整，就于9月5日（七月二十日）出动，驶向浙江。同时，为了保证增援英军顺利北上，也为了加强对清政府的威胁，英军在兵力并不充足的情况下，留下“都鲁壹”号、“卑拉底士”号、“阿吉林”号3艘军舰及陆军、炮兵约550人盘踞鼓浪屿。

三、定海再陷 三总兵英勇殉国

璞鼎查率领英军北犯浙江，按照英国政府的命令首先要重新攻占舟山群岛，接着还要占领镇海、宁波。因为这些地区被英国政府视为英国商品打入中国富庶地区的最重要的入口，又便于英军屯兵待援、充作继续北犯的基地。显而易见，这些地区的坚守，对于挫败英军的侵略计划，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1841年2月25日（正月初三日），英军以浙江当局释放英俘为交换条件，撤出了舟山群岛。当天，定海镇新任总兵葛云飞、安徽寿春镇总兵王锡朋、浙江处州镇总兵郑国鸿率清军5000余名开赴定海驻扎。两天之后，接替伊里布任钦差大臣的裕谦抵达镇海。此时，裕谦接到广东巡抚怡良的咨文，获悉英军霸占香港的消息，毗裂发指。他判断：英军难保不再折回定海，“为今之计，唯有一面抚恤难民以收人心，一面择要设守以固我圉”^①。他迅速采取了如下措施：

一、妥善安置定海难民，资助无处栖止者搭盖房屋，发给不得温饱者一些口粮，同时严明军纪，规定不许官军占住民房、擅取民间财物、奸淫抢夺、欺寡凌弱，违者就地正法，并惩处其上司。

二、褒奖爱国抗英的群众，严惩认贼作父的败类。裕谦通过调查，判明俘获英军上尉安突德的勇士是定海居民包祖才等，便断然推翻伊里布的冒功之辞，对包祖才等从优嘉奖。同时，认真查证落实了汉奸布定邦（为英军筹办军粮）、虞国珍（为英军刺探情报）、郁秀钦（为英军统治定海出谋划策）、杨阿三（指引英军捕拿包祖才家属）等人的卖国罪行，将他们处以死刑。

^① 《钦差大臣裕谦奏为驰抵镇海接受钦差大臣关防并赶筹善后事宜折》，《鸦片战争档案史料》第3册，第171页。

三、出示抨击妥协派甘受侵略者愚弄、误国病民的行径，以江苏军民击退英军来犯的事实说明英军没有什么可怕，消除一些人的畏敌情绪。

裕谦的措施，伸张了正义，使深受英军蹂躏之苦的定海人民得到了慰藉，故受到民众的热烈拥护。当裕谦号召民间广为团练时，到处都积极响应。在定海、镇海、乍浦三处，共有 1870 多人应募为水勇。许多群众自发地巡防海口，出海侦察敌情。3 月 20 日（二月二十八日），英军运输船“佩斯汤基·伯曼基”号窜到定海，船长畏林士得带 5 名黑人兵驾舢板往青龙港洋面，伺机上岸。镇海县民严鹤林等人诱擒畏林士得，并砍伤敌兵 3 名。

在加强浙江沿海防务方面，裕谦认为：“定海之设守，为目前第一要务”^①；此外，镇海外可扼定海之吭，内可保障浙东之全境，防守是否坚固也极其重要；还有乍浦，“实为西浙之咽喉，东吴之门户”^②，也应作为设防重点。3 月下旬，裕谦亲赴定海，停留 8 天，仔细观察形势，与当地文武官员商讨设防方案，决定在濒临大海的青垒山至竹山之间筑起一道 1400 余丈长的土城，在土城后的东岳山上建炮城 1 座，并在东面的青垒山、西北面的晓峰岭等高处建瞭望台，择要安设炮位。这些军事工程，在定海民众的大力支持下，6 月中旬均告完工。此外，裕谦还不断向定海增兵运炮，到 4 月中旬，定海的防兵已达 5600 人，设各种炮 70 位。镇海的防务由裕谦和浙江巡抚刘韵珂共同筹划布置，有防兵近 5000 名，扼海口险要的金鸡山、招宝山添修了炮台，密排炮位；甬江（大浹江）出海口，以巨舟载石凿沉堵塞，江面上还拉起铁索。

值得一提的是，6 月中旬，林则徐奉旨以四品卿衔来到镇海协办军务。尽管朝廷无意重用他，但他仍对镇海的防务倾注了全副精力，不辞辛苦地跋山涉水，登高陟险，走遍招宝山、金鸡山、东岳宫、县城外围各处炮台及海口，为加强防守出谋献策。浙江防务中有一个突出的困难就是缺乏大炮。鉴于这种情况，林则徐与宁波府教授冯登府、余姚县令汪仲洋、嘉兴县丞龚振麟等共同研究他从广东带来的载有西方铸炮技术的《炮书》，很快就铸造出八千斤铁炮，并装上吸收当时西方四轮炮车优点而又加以发展的可以移转炮身的“磨盘新式炮架”。裕谦是林则徐的老友，深知林则徐“向为兵民所悦服，逆夷所畏惮，其一切设

^① 《钦差大臣裕谦奏为查探英船动静并请酌借闽省炮位折》，《鸦片战争档案史料》第 3 册，第 217 页。

^② 《钦差大臣裕谦奏报查明乍浦防堵及江浙沿海情形折》，《鸦片战争档案史料》第 3 册，第 577 页。

施，亦能体用兼备”^①，他由衷地欢迎林则徐到来，“意中将倚为左右手”^②。但万万没料到，7月13日（五月二十五日），在他刚与林则徐相会于镇海、开怀畅谈之时，一道将林则徐遣戍新疆伊犁的谕旨从天而降。林则徐又被剥夺了抗敌报国的权利，悲愤满腔；裕谦也痛失谋主，心情沉重。在朝廷再次转向妥协之后，裕谦仍坚决主张加强戒备，并于7月下旬前往乍浦巡视，布置驻扎绿营、八旗兵1000余名，募勇670余名，设铜铁大炮30位，在险要处增修炮台。

9月7日（七月二十二日），厦门失守的消息通过颜伯焘的咨文传到浙江。在此前后，“浙洋夷船，忽隐忽见，日渐增多”^③。英军对浙江的进犯已经迫在眉睫。于是，裕谦坐镇镇海，“严申军令，誓之于众，如遇夷船驶近口岸，务各按照派防地段，连环轰击，痛加剿洗，不准挪移寸步”^④。12日，英船“赖拉”号大副温里，带20多名英军驾舢板在镇海东南面的盛岙登岸，企图上山侦察镇海军情，当即受到守军和民众的截击，结果温里及仆从1人被俘，其余狼狈逃窜。温里解往镇海后被裕谦下令处决（仆从伤重死于途中）。

定海是浙江抵御英军的最前哨，驻守这里的葛云飞、王锡朋、郑国鸿三位总兵，都是矢志报国的将领。尤其是葛云飞，素来崇尚南宋抗金英雄岳飞，以“不爱钱”“不惜死”作为座右铭。他痛恨英国的鸦片侵略，对当权者在战争中“忽剿忽抚，总无定见”^⑤十分不满。率兵进驻定海之后，他立志“不避艰危，务尽我心”^⑥，坚决捍卫祖国领土。为了加强定海防务，他呕心沥血，仔细查勘地形，制订设防计划；在修筑土城的过程中，他与军民一起顶着烈日苦干。就当时清军的状况而言，几路军队同守一地，将领不和、相互掣肘是司空见惯之事，但定海三总兵都以国事为重，不分畛域，密切配合。厦门失守的消息传来后，三总兵义愤填膺，加紧备战，葛云飞昼夜驻守东岳山上的炮城（名镇远城），

① 《钦差大臣裕谦奏请派林则徐差使并拟驻扎嘉兴居中策应折》，《鸦片战争档案史料》第3册，第466页。

② 梁廷枏：《夷氛闻记》卷三，第94页。

③ 《钦差大臣裕谦奏报浙洋英船日增并筹防御情形折》，《鸦片战争档案史料》第4册，第55页。

④ 《钦差大臣裕谦奏报浙洋英船日增并筹防御情形折》，《鸦片战争档案史料》第4册，第55页。

⑤ 葛云飞：《致朱世禄书》，阿英编《鸦片战争文学集》下册，古籍出版社1957年版，第1009页。

⑥ 葛云飞：《致朱世禄书》，阿英编《鸦片战争文学集》下册，古籍出版社1957年版，第1009页。